

【西部大开发】

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陈金良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工具,论述了跳跃式经济发展的两种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以及由制度结构变迁引发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加快科技创新、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发展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实现路径。

关键词:市场诱导型模式;计划主导型模式;制度结构变迁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1-0020-04

一、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涵义及其形式

1. 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市场诱导型模式与计划主导型模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实质上是由经济发展和制度结构演变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从生产力角度看,根据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市场诱导型模式和计划主导型模式。市场诱导型模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动态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推动均衡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经济不断演进,并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而产生加速效应,从低分工水平的角点均衡跳跃到高分工水平的角点均衡,当全部均衡跃升至完全分工状态时,产生大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跳跃式增长。

这种模式是由市场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协调人们各自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组织大规模的复杂的分工,推动分工自发演进,达到完全分工,实现社会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这是一种动态非均衡模式,是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模式,也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计划主导型模式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计划手段,在极短时间内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环节,在多个部门建立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企业,迅速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经济跳跃式增长。其实质是一种计划主导型的均衡发

展模式。如前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初成功地实现了大推进工业化,中国在“一五”时期的 156 项重点工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加速工业化进程。这种计划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式的缺陷是,不能创造出新的工业化模式,一旦模仿潜力耗尽,最后会衰落下去。

1949 年后,出于赶超需要,国家采取了计划主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重化工业超前发展,在西部投资兴办了大批以采掘和原材料为主体的资源导向型产业。根据国内外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单纯靠资源导向型工业的发展,走“卖原料”的路子,往往难以启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事实证明,这些资源导向型产业由于布局分散,自我循环,加工链条短,加工层次低,加上产品价格低,市场需求的涨落,以及地区资源的枯竭,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严重时会引起经济结构性衰退。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工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工业产值比重逐渐下滑。除四川省以外,其余九省区 1979~1998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的工业增长速度也低于改革前的水平[1](P5)。这主要是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效益低引起的,因而是一种结构性衰退现象;而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干扰了市场经济自我调节机制是根本原因。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战后采取市场导向型模式的

收稿日期:2001-05-20 修订日期:2002-04-02

作者简介:陈金良(1959-),男,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高于采取计划主导型模式的国家,这表明计划主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已不适合我国国情。

2. 由制度结构变迁引发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当制度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为了响应制度改革带来的获利机会,取得制度改革的巨大收益,推动制度结构从低收益均衡水平向高收益均衡水平的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由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构变革与创新诱发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思想意识形态变迁引发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由经济制度结构变迁推动地区经济跳跃式发展的范例很多。如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模仿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形式而进行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试点,以及各地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我国改革开放积累了有益经验,它既是制度变革的窗口,又是推动地区经济跳跃式增长的“发展极”。由社会经济形态超越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的典型,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如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直接跳过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跳跃式增长。

马克思(Marx)和诺思(North)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同经济增长非同步的超前性与滞后性,因而,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落后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从世界经济增长史看,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思想文化变革在前,经济技术变革在后,如文艺复兴运动间接导致了产业革命。

政治制度结构也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制度结构僵化,体制改革滞后。主要表现为:企业和劳动者税费重,要素收益率低,资本积累少,市场需求不旺;政府机构臃肿,手续繁琐,办事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2]。因此,精简机构、清理杂费势在必行。

二、市场诱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与制度结构变迁模式并不排斥

市场诱导型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靠价格机制,促使各生产要素在一定的区域或产业集聚,形成各要素有机统一的“强磁场”,通过“聚合效应”和“扩散效应”,实现更高的均衡分工水平,推动该区域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运

行的载体,也是制度变革政策和措施的落脚点。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是推动制度结构变革的主导力量,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所以,市场诱导型模式与政府制度变迁模式是有机的统一。

经济高增长率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高变化率;经济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变化,现代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3](P500)。

按照新增长理论,由市场均衡分工水平产生的分散经济均衡增长率将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要求实行政府干预,以缩小乃至消除市场均衡增长率和社会最优增长率的偏差,提高社会均衡分工水平。市场均衡分工水平的提高太慢,必须靠政府政策和制度变革来加速。

仅靠市场机制引导各生产要素追逐高收益率,选择高收益的均衡分工水平,促使全部均衡分工水平向高层次非连续演进,一方面受区域分工水平和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地区经济增长机制的制约,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因此,必须靠政府制度变革和政策来引导和激励,通过实施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机制,改变不合理的地区经济增长格局,推动地区经济跳跃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要素收益率低,稀缺要素大量流出,造成专业化经济和均衡分工水平低,经济增长缓慢。这说明仅靠市场诱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难以实现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发展,离开政府的作用是不行的。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表明,制度健全,交易效率高,分工水平高的国家,市场规模就大,经济增长也快;反之,均衡分工水平就低,会出现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率也低。英国17世纪末期的经济起飞、19世纪初的高速增长,德国19世纪末期的高速发展,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跳跃式增长,美国经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二战以后至70年代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70年代的跳跃式增长,以及80年代的高速增长,都证明仅靠市场诱导型模式或仅靠政府制度变革与创新来实现经济跳跃式增长是不可能的[3]。现代经济增长是市场诱导型模式与政府制度结构变迁模式有机结合、双轮驱动的结果。

三、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

1.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跳跃式发展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摒弃了新古

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两分,以及规模经济概念,采用了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报酬递增的专业化经济,以及交易费用的微观经济学框架,运用新兴古典动态全部均衡分析法,揭示了分工随时间内生演进的规律,说明了跳跃式经济发展是分工内生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提出了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分工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初始阶段,交易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低,生产率落后,人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人们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生产率改进,人们能负担起一些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促使社会均衡分工水平提高,市场扩大;专业化水平提高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因而,人们在权衡未来专业化经济收益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选择更高的专业化模式,随着新市场的产生和原有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迅速上升。当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收益很高,分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全部均衡突然非连续地向完全分工跳跃,产生大推进工业化,推动经济跳跃式增长。但是,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由于专业化经济和分工演进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成熟期的减速增长[4]。

2. 市场诱导的大推进工业化与平衡增长理论

市场诱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部门和地区为主体,借助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投资引导,来推动地区专业化经济和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环境不断改善,实现地区经济跳跃式增长。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诱导的非均衡增长模式,也是切合我国实际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工业部门投入资本,才能迅速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停滞落后的面貌[6]。这种模式受到西部资本、技术、人才等稀缺要素的制约,脱离了西部实际,因而是不可行的。

哈维·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人均收入过低,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而,在发展初期应大规模地投资,使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促使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7]。这种理论夸大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忽视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和制度变革等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罗斯托(W·W·Rostow)将1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作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然而,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都超过了10%,有的甚至达到20%以上,却并未实现经济上的起飞;有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有增长而无发展。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过分注重物质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革的作用,不合乎我国实际,因而是不可取的。

四、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决定因素有:

1. 经济运行机制是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作用的前提 计划经济国家主要靠政府采用计划主导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也可采用制度改革推动的跳跃式经济增长模式,但其作用程度、范围和效率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制约,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也可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或高增长低效率。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靠价格机制推动均衡分工水平的自发演进来实现,自由竞争、自由价格和自由择业是其前提条件。经济运行机制不同,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也就不同。

2. 交易效率的高低和分工演进速度的快慢 交易效率取决于交易环境,它是推动分工内生演进的重要加速器;交易环境由交通、通讯技术和设施,以及制度结构等决定。分工演进速度取决于社会组织、技术、产品试验的进程和效率。一般而言,社会组织、技术、制度模式试验强度大,效率高的地区,交易效率也高,分工演进速度越快。

3. 制度结构变迁强度与效率 制度结构变革相关性越大,强度越高,经济绩效越显著;制度变革离散性越大,强度越小,结构效应越差,经济绩效越不显著。在两种基本制度结构变迁模式中,思想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先导,可以大大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提高变迁收益。我国的改革进程严格地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扫除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障碍,打破了计划经济遗留在人们思想中的传统观念,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

4. 产品技术、知识资本含量的大小 新古典经济学家丹尼森(E·Denison)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推动;而在技术进步中,知识进展是最基本的原因。库兹涅茨(S·Kuznets)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上百年经济增长史的

分析,发现知识存量的增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不仅依赖于物质投入,更重要的是知识投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靠科技进步以及知识资本的积累。知识资本是企业拥有的所有无形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资本、顾客资本和制度资本。

5. 资本供给规模及其使用效率 发展经济学家把资本投入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跳跃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的增加来推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表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超过了10%,却并未实现经济起飞,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片面强调资本投入,忽视技术进步和资金的合理配置;片面强调物质资本投入,忽视知识资本投资,导致大量资本浪费,经济效率低下。

五、跳跃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要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地区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应选择以下路径:

1. 加快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中心和大学科技园,将其作为高科技的扩散基地和促进经济腾飞的“发展极”;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推广中介组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发展科技创新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推动科技创新。

2. 加速发展各类教育,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知识的积累和智能的提高,是实现地区经济跳跃式发展的根本途径 世界银行的研究资料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其GDP可以增

加9%。地区经济发展也证明,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经济增长也越快。东西部差距实质上是教育、知识、技术和体制上的差距。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3.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是高增值、高渗透、高风险、低消耗、低污染的新兴先导产业,是实现地区经济跳跃式增长的支点。加速发展知识、技术密集产业,可以在知识经济中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并推动传统产业产业升级,加速工业化进程。信息化、网络化还可以大大加快信息、知识、技术、资本交易的速度,强化分工的网络效应,提高分工演进速度。

4.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政策是推动地区经济超速增长的有力杠杆。当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时,政府应该进行制度结构的变革与创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推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强度的制度结构变迁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带来巨大的创新收益,提高交易效率,加快分工演进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给予的一系列倾斜政策;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赖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实践证明,小政策带来小发展,大政策带来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 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研究[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2]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J]. 经济研究,2000,(5).
- [3] (美)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M]. 常勋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
- [4] 杨小凯. 经济学原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卫玲]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Leap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CHEN Jin-jiang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which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ols of division theory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deals with the two big pushing industrialization pattern, as well as the leap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s induced b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hange, and puts forward path to realize the leap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Market Inducement Pattern; Plan Dominant Patter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hange pattern